

2026年第49卷第1期 总第240期 ISSN 1000-5587 CN 13-1029/C
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〇二六年 第四十九卷 第一期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1 第49卷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期刊方阵入选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名家视野】

“解构”之限度与“价值形而上学”之可能/黄克剑/1

论中国书法是“逻各斯艺术”/赵宪章/13

【历史学:晚清史研究】

权力寻租:粤海关陋规名目及其危害/王宏斌/21

薛允升《读例存疑》的学术价值及对晚清立法的影响/闫晓君,仝孟玥/39

【哲学:科技哲学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解放、挑战与重塑/黄欣荣,蓝愉/48

数字人文工具的情境知识与技术经验的情境还原

——计算批评的另一种可能/朱恬骅/57

【文学《诗经》研究】

《诗经·汝坟》事义与二《南》的纂集/邵杰/64

刘炫《春秋规过》论《诗》平议/赵棚鸽/72

【政治学】

地方政府事权改革政策:历程、特征与展望

——以河北省为例/李艳,贾宇坤/79

论精神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之构建/刘景芝/94

数字人文工具的情境知识与 技术经验的情境还原 ——计算批评的另一种可能

朱恬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要:自“数字人文”的概念提出以来,“知识”始终构成其主要关切。以计算批评为代表的方法论,承诺在提供有关文学文本的知识之外,基于技术原理而提供有关所用技术工具的知识,并因此要求了技术工具的可解释性。然而,严格的可解释性要求会限制实践中所能采用的技术工具,而且存在概念上的困难,特别是面临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计算性诗学的解释策略,可在不涉及技术原理知识的情况下,以算法审计和黑箱化等方式,形成特定用例下对于技术工具的情境知识。不同情境知识的接合形成新的普遍性,即操作一类技术工具时人的经验的知识。这在知识形态上虽有异于当前计算批评所作的承诺,但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彰显了数字技术境况下“人”的维度。

关键词: 计算批评; 计算性诗学; 情境知识; 可解释性

作者简介: 朱恬骅,男,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计算机艺术与美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26)01-0057-07 **收稿日期:** 2025-07-17

DOI: 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6.01.013

自“数字人文”这一名称于2004年诞生以来,“知识”始终是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关键概念。从古希腊文献数据库到数字图书馆建设,^①无论它被视为对先前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的继承、发展还是分叉(“Fork”)^②,甚至是关于回归“人文”的呼声或是驾驭新技术手段的期待^③,无不开启了对“知识”的表征与管理,乃至自动化的推理与生产的设想与实践。当前,计算批评(Computational Criticism)凭借计量的方式对文学的风格、题材、内容与历史发展进行分析与研究,发展成为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方法论。

当前的计算批评呈现了两方面的知识承诺(Epistemic Commitment)^④。一方面,计算性的方式可以提供有关文本本身(如形式、载体)及文本中所承载(如命题)的知识,可称为文本知识。过往对数字人文知识生产的考察大多集中于文本知识的有效性,筭章难(NanZ.Da)有关“计算文学研究”的批评即是

*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媒介美学研究”(项目编号:2024EWY002)

① Marija Dalbello. “A Genealogy of Digital Humanit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7(3) 2011: 480-506.

② Steven E. Jo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Taylor & Francis, 2013.

③ 例如金姿奴、吴静《数字人文是“人文”的失语吗?——重审数字人文中“人文”的角色与价值》,《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曾军《从数字人文到AI人文:人文研究范式的变革》,《东南学术》2024年第4期。

④ Michael P. Lynch “Epistemic Commitments, Epistemic Agency and Practical Reasons.” *Philosophical Issues*, 23(1) 2013: 343-362.

其中的显例。^①但在另一方面,计算批评目前越来越强调提供有关所使用的技术工具本身的知识,也就是“解释工具”并“通过工具思考”,而且在“数字人文自身的形式语言和操作规则”框架内完成自反的考察。^②这方面的知识可称为工具知识。

从文本知识到工具知识的要求,是“数字人文”知识领域扩张的体现。可以说,相对于狭义的“人文计算”而言,“计算批评”已从文本文献的整理和文本知识的“管理”,延展到计算技术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的自觉审视上。本文意图表明,计算批评在提供工具知识上具有独特功能,可以提供有关工具运用的情境知识,进而通过对工具知识的情境还原达成对技术经验的普遍性认识。

一、技术“透明性”视角下的“可解释性”

计算批评致力于从使用的技术手段本身获得深入的反思性理解。它以破解算法的“黑箱”为己任,以“反操作”来反思算法中隐含的预设及其有效性。当前为计算批评所倚重的技术方法,侧重于寻求相对明确的数理统计指标和知识表征。至于目前在其他领域流行的、以语言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系统,总体上则处于这类“可解释工具”的对立面而遭到拒绝。^③计算批评的支持者通常认为,人工智能系统是“透明”的,无法像统计工具那样找到明确的解释。

计算批评对技术工具做出的要求,是对技术“透明性”历史演变的一种回撤。在1995年出版的《屏幕上的生活》(Life on the Screen)一书中,雪莉·特科尔(Sherry Turkle)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透明性”在计算机技术语境中发生的语义颠倒。她认为,以微软MS-DOS系统为代表,80年代初的计算机技术界赋予了“透明性”以“打开引擎盖并查看”的意味。“但是在80年代中期,苹果麦金塔(Macintosh)的用户开始谈论透明性时,他们指的是通过具有吸引力和易于理解的图标,来看到他们的文档和程序。”^④这套拟物的设计语言,遮蔽了对于计算机内部实际运作机制的认识。人们只知道如何让计算机工作,并不知道计算机的内部如何工作。最终,到80年代末,后一种含义占了上风,成为“透明性”一词“在电脑术语和口头语中”的通常含义。

新的“透明性”是工具为实现用户使用目的,而在实施效果上产生的透明性。计算机系统的内部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变得“透明”,但无法被人注意到。这样的状态,无疑属于计算批评所批判的那种将工具“神秘化”的情形。与之相对,特科尔认为使用MS-DOS的用户通过在“目录”中执行命令,将一个“程序”施加于指定的“文件”之上来工作,这使得他们必须将自己的任务分解为一系列计算机能接受的有限命令。这种MS-DOS式的“透明”可以说是计算批评所欢迎的,它意味着用户对于计算机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知情权,从而能够把握技术工具运作的每一个过程。

然而,仔细审视MS-DOS和麦金塔系统各自代表的两种“透明性”,虽然它们在外表上表现得截然对立,但却存在共通之处。如果说麦金塔系统是用图形界面遮蔽了计算机的内部运作,那么MS-DOS未尝不是用文本的界面提供了内部运作的“假象”。可比较“目录”“文件”的概念与机械硬盘中磁盘“柱面”“磁头”“扇区”的编号体系:后者依照一定次序对可见的磁盘上的不同位置进行了编号,从而在原则上可以由“好奇的眼和摸索的手”(Curious Eye and Probing Hand)^⑤,也就是对人类自己的知觉器官所部分地探查——在无尘室中拆解机械硬盘,就能看到排列整齐的磁头和有磁性材料涂层的盘面。相反,“目录”“文件”则是在人所不可能探及的微观尺度上,无法感受到的磁性变化所记录的信息。至于它以文字的形式还是以拟物设计的图标形式显示在人们面前,则无关紧要。

实际上,无论是特科尔用麦金塔例示的目的透明性,还是用MS-DOS例示的过程透明性,在相当程

① Nan Z. Da. "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 *Critical Inquiry*, 45(3) 2019: 601-639.

② 赵薇《作为计算批评的数字人文》,《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③ 赵薇《作为计算批评的数字人文》,《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④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42.

⑤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79.

度上都属于唐·伊德(Don Ihde)所说的“诠释学透明性”的范畴,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用户知觉的对象都指向了“没有被直接看到的东西”^①。参照这一观点,不同的操作系统、软件或运作方式,只是要求人们将不同的事物视为无需进一步解释的“真实”,技术“透明性”在此显现为一个相对的概念。麦金塔系统固然比MS-DOS更“透明”,但在现代更为易用、直观的操作系统面前,这种“透明”无疑又是捉襟见肘的。如果对于工具“可解释性”的要求必须反对麦金塔式的“透明性”,那么它应当反对所有不同程度的“诠释学透明性”,才能在计算机内部发生的计算过程,同外在表现之间建立明确的确定性关系。

然而,这种确定性关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已经用“软件不存在”这个口号,预演了将过程透明性推进到底的结果——不存在软件,而只有指令信号在芯片中的奔流^②;沿着这一思路,即便芯片也不构成终点,而只有到达电子这样全同粒子的层面,审视它们在场效应管栅极中的状态,才能提供某种“终极性”的基石。换句话说,对“可解释性”的要求,最终消解了被解释的技术工具本身的存在。

人们需要将一些复杂的原理(譬如数组排序的具体实现)搁置,思考其目的而非其过程,才能有效地将事情进行下去。对“透明性”的彻底反对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相悖的。但另一方面,“透明性”应当保留到何种程度,或者说何种算法是“琐碎”的,这一标准并不像看起来那般容易划定。如前所述,一款软件调用了哪些算法、算法本身如何实现等问题,对于开发者来说都可能是不清晰的,因而他们不得不根据有关功能的说明,不加批判地加以承认。因而当下的局面,不仅是使用者对技术工具的运作细节难以知情,甚至连编写、制作这些技术工具的人也可能有所不知。这种不知情的状况使得“划定”变得不可能,由此驱使开发者使用某些现成的软件来架构新的技术工具,而这貌似只是对于原作者的信任而已。

这样,对“透明性”的反对就在概念和实践上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唐·伊德认为,“现实的或物质性的技术总是具有部分透明性或准透明性(Quasi-transparency)”^③，“完全的透明性”意味着技术的消除,而完全的不透明则意味着技术的不可用。这也正是为何对工具的意识往往产生在工具失效与故障之处,如伊德所说的“诠释学关系”中“技术”与“世界”之间“连接失灵”的状况。^④同样,完全了解算法的所有细节,和对算法一无所知都是不现实的,两者都脱离了技术发明和使用的社会情境。事实上,在特科尔提供的一个案例中,一名哲学研究生甚至只有“在使用麦金塔系统时,才第一次感觉能够深入计算机中,因为麦金塔让她感到足够安全,以至于她敢于这么做”^⑤。从技术工具中驱除“透明性”的尝试,在社会后果上将加深技术鸿沟,而不是普及工具知识。

对于技术工具可解释性的需要无法彻底清除技术“透明性”,而只能相对地清理。因而可解释性的概念,连同计算批评对可解释工具的要求,都需要相对化。这样,我们就不能说诸如语言大模型这样的技术工具,绝对地不能得到解释,从而为它们重新进入计算批评的工具库保留了可能性。同时,“透明性”的建立都涉及某种发生在使用者与技术对象之间的解释过程,表明“可解释”并不完全是“工具”的属性,而是与具体的解释路径有关。对技术工具“可解释性”的要求,实际上是对人们就技术工具做出解释的有效性要求。这促使我们将重点从筛选出可解释的工具,转移到“解释”本身的有效性上,即:如果要将某种技术工具应用于数字人文的研究中,做出怎样的“解释”才是有效的?

二、计算性诗学策略下工具知识的情境性

考虑数字人文中经常使用的词频统计工具,存在两种检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考察程序的源代码,

①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② Friedrich Kittler. "There Is No Software." in John Johnston, ed., *Literature,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s: Essays*. Amsterdam: Oversea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1997: 147-155.

③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韩连庆译,第80页。

④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韩连庆译,第92页。

⑤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38.

寻找到处理诸如词形变换等方面的部分,检查它们是否能够涵盖所有的语法规则。从概念角度,针对代码的检查能够将特定的技术工具与普遍的技术原理联系起来。其基本算法就是计数,并且英语“词”的概念是明确的,而程序代码里也周全地覆盖了种种特殊情况。对于代码的检查诉诸技术原理的普遍性,为特定的技术工具建立了解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从原理层面建立层级性的、因果性的联系,就意味着这一技术工具是可解释的。计算批评所要求的可解释性以技术原理为有效性基础。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可能采取另一种方法,即选取或构造一些已知结果的输入文本,它们尽可能地涵盖某种语言中的所有规则与特例,检验程序在这些文本上的输出是否符合预期。甚至,人们可以采取它的一种弱化的形式:针对所要处理的某类文本,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人工核查,如果与程序的输出吻合甚或只是部分吻合,人们就认可了这种程序的有效性并将建立起“词频”的解释。这样的方法并不要求有关技术原理的知识,但却需要对所处理的文本有充分的把握。不仅如此,即便是展开了充分的代码静态分析,仍然需要实际运行的测试才能确认其功能。人文社科语境中,研究者采用“算法审计”的名称^①,以突显软件是否如预期运作,这不仅是一个功能上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性的影响。

由此看来,是否掌握技术原理的知识,实际并不是获取工具知识的必要条件。对可解释性的要求,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技术原理知识(无论是算法的、观念的,还是器具的、物质的)的基础上,而是可以建立在技术工具的行为表现(Performance)上。这就引入了我们在先前的工作中所提出的计算性诗学(Computational Poetics)这一解释策略。^②作为一种“诗学”,它的目标是完成从技术工具到观念的“复原”,并最终帮助使用者陈述自己与技术工具打交道的经验;它是“计算的”,因为它不仅承认所解释的对象是在计算中产生,而且它本身就促成人们中断、介入、改变计算过程,从而制造出新的被解释的对象。

计算性诗学提出了一种无关技术原理的解释方式,并可以迁移到数字人文所关心的工具知识上。其所提供的第一种方法,是在算法审计中着重考虑对抗性的输入用例,如乱码字符、上下文关联缺失的要求、彼此冲突的指令等,以显现工具设计者预设的处理范围和处理策略。与“神秘化”的倾向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技术工具输出结果无条件地信任,而是悬置输出结果的字面意涵,关注输出结果与各方输入文本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工具在不同提示词下给出的反应如何变换,或同一提示词在应对、处理不同输入文本时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获得关于文本和提示词影响的认识。

同时,计算性诗学还向深入的技术工作开放,而且也鼓励这种介入模型运行过程的行为。开源的语言大模型为这种介入提供了可能。先前在GPT-2基础上完成的工作展现了它的可行性^③,也就是在大模型的绝大部分保持“黑箱”的状态下,可以对个别神经网络层(运算过程)的中间结果进行操作,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提升大模型在特定领域中的行为表现。这引出了计算性诗学提供的第二种方法,即黑箱化。它意味着人们对输入输出对应性关系上的行为表现具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也就是“黑箱”概念的提出者罗斯·艾什比(W. Ross Ashby)所说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系统化设计的实验操作和记录加以探知。^④通过将特定部分的技术复杂性保持折叠的状态,也就是维持其“透明性”,人们可以专注于工具的某些局部,介入、改变其计算过程,并用这些有意的改变得到意图的结果。此时,尽管技术的原理和实现细节等内容保持不可见,但在原则上仍然是可知的,从而使其避免了“神秘化”。

上述两种方法都提供了某种知识,即以替代技术原理,而帮助使用者得出有关技术工具的有效解

^① Christian Sandvig, Kevin Hamilton, Karrie Karahalios, and Cedric Langbort. "Auditing Algorithms: Research Methods for Detecting Discrimination on Internet Platforms." *Data and Discrimination: Converting Critical Concerns into Productive Inquiry* 22(2014): 2014: 4349-4357.

^② 朱恬骅《从可解释性悖论到计算性诗学:人工智能文本生成的解释策略》,《求索》2025年第3期。

^③ Gaurush Hiranandani, Haolun Wu, Subhojyoti Mukherjee, and Sanmi Koyejo. "Logits Are All We Need to Adapt Closed Models." *arXiv*: 2502.06806, 2025.

^④ William Ross Ashby.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56: 88-89.

释。对第一种方法而言,算法审计提供了对技术工具行为表现成系列的记录,从中可以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但是“算法审计”不能控制工具本身的迭代和改变,因而在某个时刻应用这个工具所产生的结果、所归纳出的“规律”与下一个时刻工具的行为表现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而是基于技术工具本身相对具有稳定性的信念。对第二种方法而言,黑箱化接受了原技术工具的某些前提,并且以此为基础,用新的计算方式改变了工具的行为表现,以使深入其运作过程的认识得以可能。因此,黑箱化建立在对某些前提的信任上,这种信任本身又可以通过“算法审计”的方式得到建立。

以计算性诗学的方式得出的“解释”,只能对操作的人和调查的对象有效。它们不是关于技术类型和作为类型的技术对象的,而是面向此时此刻与人打交道的具体人工智能系统、具体的技术工具。但这样的“解释”,由于其认知上的功能和帮助使用者继续其操作的效用,仍不失为一种知识,我们可称之为情境知识。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揭示的,哪怕是以普遍性的面貌呈现的知识,都具有情境的根源。它们是在受限的视角下得出的,带有特定的立场并嵌入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和身体因素构成的复杂背景中。^①哈拉维还将复数的“情境知识”用作一种“缩略语”,以坚持“最简单的事情也必然包含对立的阶段(Contradictory Moments),并对任何消解它们的方式保持警惕”,指出“情境化知识”归根结底建筑在“责任意识”(Accountability)的基础上。^②因而在成为普遍的、“中立”的观察之前,首先存在的是有社会、历史和文化“位置”的“有情境的知识”。而正如数字人文语境中不断出现的“知识生产”短语所暗示的,知识具有其生产者,这种知识生产者对其所处情境中的权力结构应当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因此“情境化知识”同时还是“意识到对情境的责任的知识”。算法审计和黑箱化分别突出了这两个方面,由此表明由计算性诗学提供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是这种特定的情境知识。

在面对技术工具,特别是语言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系统时,人们同这些工具交互时获得了某种“有情境”的认识,以服务特定的目的,在这种对有限性的自觉基础上,才能“意识到对情境的责任”。举例而言,就是人们意识到语言大模型生成的文本不能从字面理解(如让模型“自述”其原理),更不能将其推及所有同类技术工具。通过将解释的有效性局限在具体情境中,计算性诗学允许人们在不清楚技术原理和实质的同时,依据计算过程向人呈现的可见内容取得解释,此时解释的有效性建立在对情境本身的把握程度上。因而情境的限定同时也是计算性诗学提供的解释的有效性根基,其中获得的知识具有某种“临场性”,也就是对于某种意图、在某种输入的情况下,这一技术工具是合用的,但并不对其他意图(甚至同一意图下的其他输入)提供任何担保。

三、由情境还原重建工具知识的普遍性

情境知识不仅就适用的对象而言受到某个特定用例的限制,而且就知识的持有者而言,它属于个别现象。情境知识甚至不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因为后者毕竟还是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群体所共有,并与这一社会和文化条件存在明显的关联,可以揭示该文化的某些面相。它们类似日常生活中“昨晚下过雨了”或“这班火车已经开了”这类知识。将它们与气象规律、列车时刻表等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相比较,人们可能会质疑情境知识的价值。毕竟,技术原理的知识将技术工具还原(Reduce)为一系列技术对象的结合,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概念的。人们用这些技术的运转机制来解释甚至预测技术工具的行为表现。作为原理,这样的知识具有无可辩驳的普遍性,并因其普遍性而在具体的技术工具事例中发挥作用。

但在数字人文的语境中,琐碎和局限的情境知识反而比普遍性的知识更能帮助人们摆脱对技术工具的“神秘化”。正如计算批评所表明的,数字人文中的工具知识和文本知识并不是割裂的,获得工具

^①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3), 1988: 575-599.

^② Donna Haraway. "Reading Buchi Emecheta: Contests for Women's Experience in Women's Studies."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1(3), 1990: 240-255.

知识的目标仍然是为了使用工具获得文本知识。而将工具知识的有效性、对工具的“解释”的有效性限制在与所给定的文本、所提供的数据集的范围内,则是重申研究者对文本知识的责任。研究者不能做出或获得有关技术工具通用性的保证,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每一个使用情境中,研究者必须自己检验技术工具是否合用,必须对技术工具的每一个输出负责,如此才能将它们用于进一步的知识生产。换言之,无论选择何种技术工具,甚至不选择使用任何技术工具,研究者对所从事的知识生产都负有同等的责任。这意味着数字人文并不是一个带有特殊“豁免权”的领域,人们仿佛可以仅凭新技术工具的发明与应用,而使研究问题获得人文学术上的价值。同时,既然那些貌似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在起源或实质上也都是有情境的,反过来也就暗示着存在着某种途径,使“有情境的知识”可以转变成为普遍知识。特科尔关于不同“透明性”观念的讨论,实际上就为这种从情境知识出发重建普遍性知识提供了一个案例。借助对不同学科背景、接触不同技术产品的学生进行访谈和行为调查,她表明设计如何塑造了具体的人机互动,进而产生的感性体验培养了不同的操作习惯,最终形成了对于计算机的不同技术经验。

这就引出了计算性诗学的第三种方法,也就是对使用者群体经验的考察。其目标是从大量的情境知识中,提取出使用者共同的集体经验。在具体实践上,也就是从人们所做出的种种貌似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所作的证言出发,将其还原为受特殊用例限制的情境知识,并深入其用例本身的性质,来发现表述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错位。在现今各种技术工具层出不穷且大为普及的状况下,人们并不缺乏对技术工具(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内部结构的原理性认识,但叙述自身经验的恰当方式却大为缺乏,从而使其不得不诉诸技术提供者所编织的拟人话语。理解人们如何在与技术工具的交互中获取和建立各自所需的情境知识,从而刻画出数字人文场景中有关技术工具的情境知识所具有的总体特征,以测绘其边界。

这就将问题的重心从“工具”转回“人”,将技术工具视为数字人文这一特定类别的实践活动下社会交往的中间产物和调节媒介。在群体经验考察中,开展算法审计或以“黑箱化”方式介入计算过程,不是为了知道计算机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知道人们想要它做什么;不是为了证明工具是否普遍有效,而是为了理解人们如何看待技术工具,并且如何促成了这些工具本身的变化。相比于事先把握各种技术起作用的条件,它要求的是理解透彻人们实际运用这些技术的情境,从中获得有关“使用技术的人”的普遍性知识。对诸多个体的持续观察、对不同情境知识的综观,这样的方法可以称为情境还原(Restoration),也就是从既成的技术事实中重新还原出人们各自持有的“情境知识”与相关预设。

必须承认,如此重建普遍性的知识,与甄别可解释和不可解释的技术工具,并运用有关技术工具的知识重新解读文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计算批评号召“数据、模型、细读、理论”的四元循环方法论,实际是将自身塑造为一种“元理论”,位于各个以“细读”为方法生产出的阶段性“理论”之上,最终提供普遍性的文本知识。这一循环能够运转的基础,在于假定了工具知识提供了概念上可逆的方式,理解文本如何转化为数据,并从给出的数据重新回到对文本的“细读”,使“理论”成为某种超越原本数据的文本知识,从而为下一阶段数据的选择与转换、模型的运用等提供指导。

然而,技术工具处理的不是某种普遍文本生产过程的产物,而是受到特定数据化方法(如关键词、特征量的选取等)限定下文本的某些相关性特征。由此产生的“理论”本质上只是对原输入数据的呈现和概括。凯瑟琳·博德(Katherine Bode)指出,对数据(以某种物质性的方式存在)与文本(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文本)之间的差别缺乏思考,是用计算方法进行文学研究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她指出,“计算与文学现象是分开的”,“计算是一种技术和物质过程,与读者、文本和阅读相分离”,是对那些“以复杂而连续的方式发生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简化,以便于进行计算操作。^①

回看计算批评之所缘起的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所提出的“形式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 of Forms),该学说认为,数据是文本的某种特定的物质化形式,这种形式对人的阅读来说是无效的,而正是这种文学文本与数据的分离,揭示了计算批评是对“数据”本身特性的呈示,它与原始的

^① Katherine Bode. "What's the Matter with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 *Critical Inquiry*, 49(4) 2023: 507-529.

文本层面至多只能保持部分的、有视角限制、带有立场和语境的联系。要对文本的数据化方式提供新的指导,只有从数据之外的视角回归人对文本的阅读,才能发现以之前的数据为基础、以工具知识为解读框架的“理论”的缺陷,进而重新规划从“文本”到“数据”、再到“理论”的文本知识生产。

计算批评希望进行规则明确的数据表征,用可解释的工具(软件程序、统计变量)获得有意义的数据结果,继而通向有关文学文本生产的普遍知识。它的基本路径是技术原理的还原,且遭遇了“软件不存在”的悖论,并为无法完全消除也无法完全达成的“透明性”所困扰。计算性诗学以在操作中获得的情境知识为根基,以对工具知识的情境还原为途径。它将“解释”从技术原理的范围拓展到与具体的技术产物交互的经验上,并从关注技术工具转变为关注技术工具的现实应用,进而发现情境中的共通之处。

结 语

从计算性诗学的角度来看,计算批评所召唤的工具知识,不是技术工具的遴选和使用指南,而是对运用技术工具的经验提炼。这些工具不是“代替”了我们思考、生出共通的“理论”,而是给了我们差异、有局限但仍可理解、可交流的经验。这种经验上的共通性,有助于整合和克服震惊或恐慌、膜拜或鄙夷的技术体验,从而克服将技术工具“神秘化”的倾向。它依靠对技术操作的反思认识,也就是把自我经验作为其中的一个样本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和参与他人的技术操作,研究他人的经验样本。这意味着对数字人文的实践者展开某种人类学式的探寻。

如此,我们描绘了一条回到“人本身”的路径,让计算批评的另一种可能从计算性诗学之中显现。需要重点审视的不再是技术原理,而是技术工具所促成的技术经验,以及关于这种经验的证据与证言。情境还原为超越“数据”的局限性提供了一条途径,可以满足计算批评对普遍性知识的要求,为“数字”条件下“人”的境况提供了镜鉴。这条路径不仅在过程中完成了对技术工具的反思,而且在最终目标上相合于计算批评,也就是“使‘人’的维度在数字时代重放异彩”。

Situational Knowled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and Situational Restoration of Technical Experience: An Alternative Path for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ZHU Tian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has consistently remained one of its central concerns. Methodologies represented by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promise not only to generate knowledge about literary texts but also, based on technical principles, to provide knowledge about the tools employed – thereby demanding the explainability of such tools. However,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explainability can limit the range of technical tools available for practical use and also entail conceptual difficul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posed by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he explanatory strategy of computational poetics, through approaches such as algorithmic auditing and black-boxing, can construct situational knowledge of technical tools in specific use cases without requiring knowledge of their underlying technical principles. The articul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situational knowledge gives rise to a new form of generality: knowledge of human experience when operating a category of technical tools. Although this form of knowledge differs from the commitment made by current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in terms of epistemic shape, it aligns with the same objective, highlighting the dimension of the “human” within the digital technological condition.

Keywords: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computational poetics; situational knowledge; explainability

[责任编辑 李晓彩]